

学术史研究 主持人 陈众议

奥斯丁在欧陆的接受

龚 葵

英国小说家简·奥斯丁(一七七五—一八一七)在英国最初相对受忽视,但后来影响持续扩大,甚至被视为与莎士比亚比肩的经典作家,有关她的研究、评论和著述出现了“大爆炸”。与此相似,她在十九世纪欧洲也曾普遍被忽视,二战后才引起受众日益增加的兴趣,特别是一九九〇年代以来随着相关影视作品大量涌入,出现了“奥斯丁狂热”(Austenmania)。本文简要概述近二百年以来奥斯丁在欧陆的接受情况。

十九世纪里,奥斯丁的欧洲读者主要局限于法国、德国及荷兰,这些国家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水平较高。而弗兰德尔、希腊、芬兰和斯洛文尼亚等国家和地区,正忙于争取民族独立或者文化主权,并不欣赏奥斯丁的风俗小说(romans de moeurs)。总体而言,欧陆读者更推崇司各特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奥斯丁甚至比不上伯尼(Frances Burney,一七五二—一八四〇)、艾奇沃斯(Maria Edgeworth,一七六八—一八四九)等同时代英国女性作家,

往往被认作是道德论者,甚至清教徒作家,说教太多、缺乏幽默感。这类看法与奥斯丁原作及当时的英国主流评论南辕北辙,似乎表明,奥斯丁小说“本土性”很强,其卓越艺术成就以及与语言和叙述深度交融的思想内涵即使在同源的欧洲语言中也不容易译。

法国民众接触奥斯丁较早,但多半误读了她的小说。奥斯丁小说在英国面世不久,法国就出现了相应的译本。当时,法国公众正迷恋伤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之一为Anthony Mandal and Brian Southam eds. *The Reception of Jane Austen in Europe*, London: Continuum, 2007.

Anthony Mandal, "Austen's European Reception" in Claudia L. Johnson and Clare Cuite eds. *A Companion to Jane Austen*, Wiley-Blackwell, 2009.

1815年,孟多丽(Isabelle de Montolieu)翻译了《理智与情感》(*Raison et Sensibilité*);1816年,市面上出现了匿名翻译的《爱玛》(*La Nouvelle Emma*);同年,魏乐曼(Henri Villemain)翻译了《曼斯菲尔德庄园》(*Le Parc de Mansfield*)。到1824年,奥斯丁的六部小说均被翻译成法文。See Noel J. King, "Jane Austen in France",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Vol.8, No.1 (Jun., 1953), 1-26.

感小说,起源于德国的浪漫主义小说颇受青睐。滑铁卢战役后,法国人对外国文学敞开大门,大量外国小说,尤其英国小说,被匆匆翻译过来。由于需求量大,一些不知名的作家也被介绍到法国。

奥斯丁在法国“登陆”,得益于孟多丽(Isabelle de Montolieu)的译文,令人啼笑皆非。孟多丽以翻译闻名,出版了一百零五卷的作品,其中多为英国和德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孟多丽的英语和德语修养不高,往往由别人翻译大概,她凭着文学想象加以润色修饰。许多段落算不上“翻译”(traductions),仅仅是“仿作”(imitations)。但是,她却能把握读者的偏好,在翻译中酌情添加哥特式情节和人物,这恰是奥斯丁小说《诺桑觉寺》所戏拟的。奥斯丁语言的多义性常被忽视了,原文的反讽未能表现出来。比如《理智与情感》第二章,约翰·达什伍德妻子的吝啬和算计,竟然被译者一厢情愿以“母爱”(amour maternel)消解了。

值得注意的是,奥斯丁赢得了两个法国人的赞美。一个是十九世纪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基佐,《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一书的作者,一八四〇年法国实际上的政府首脑。拿破仑帝国结束后,法国推行君主立宪制,国内知识精英以英国文化为时尚,基佐算是代表人物。他明确表明自己厌恶情节荒谬、人物虚假的法、德小说,而欣赏以奥斯丁为代表的英国“道德小说”。另一个则是享誉欧洲的文学理论家和艺术史家泰纳。他不仅以“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说开创了社会批评的传统,还贯彻这一理论,撰写了当时欧洲最为详尽的《英国文学史》。泰纳将奥斯丁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并置,认为他们形成了一个新流派(“风尚小说”),专擅描写当代英国社会的中等阶层。他们的看法颇具代表性,将奥斯丁纳入一个流派来理解,而不是欣赏她艺术创作上的独特性。

如果说德国的奥斯丁小说译者选择《傲慢与偏见》出于偶然,丹麦人“冷遇”奥斯丁,倒是有着明确的原因。一九三〇年以前丹麦仅有一部奥斯丁小说的译本。奥斯丁一八一三年写给在海军任职的兄弟的书信中,曾褒扬瑞典。这一年,瑞典加入以英国为主的反法同盟,而丹麦是

瑞典的敌国,自一八〇七年以来和法国结成战时同盟。早在一八〇七年九月,英国对哥本哈根轰炸,造成了一千多平民死亡,数百座建筑被摧毁。作为战争胜利国,英国将当时隶属丹麦的挪威划归瑞典管理。奥斯丁既然不掩饰对英国军队的支持,一八一五年以后,丹麦出版商不愿意出版她的作品,也在情理之中。其实,丹麦和英国的对抗不仅影响了奥斯丁的接受,也波及几乎全体英国作家。且近代以来,丹麦知识分子的文化养料多取自德国,直到二十世纪初,他们才失去对德国文化的兴趣,转向英美。

二

十九世纪末,法国的先锋文学刊物《白色批评》(La Revue blanche)较为具体地讨论了奥斯丁,这是欧陆评论家第一次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来评论她的语言特色和叙事特点。同时该刊还分期推出了《诺桑觉寺》的最新译本。译者斐尼昂(Félix Fénéon)本人就是先锋派艺术家,尤其崇尚后印象主义风格的绘画艺术,并多年担任《白色批评》的责任编辑。《诺桑觉寺》糅合了三种不同的叙事传统:社会讽刺小说、哥特小说、浪漫传奇,选译该书也体现了他独特的眼光。斐尼昂还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显然他不满足于法国自然主义流派的小说创作,试图从英俄小说中吸取新的文学养料。《白色评论》停刊后两年,《新法国批评》面世,继续讨论俄国作家并介绍英国小说。纪德是这一刊物的发起人之一,在日记中,他赞美奥斯丁的写作技巧,认为《傲慢与偏见》臻于完美,还简单论及小说中的心理刻画、反讽和对话特点。

二十世纪初,其他欧陆学者也偶尔撰文评价奥斯丁。此时的批评受到英美研究者的影响,甚至原封不动“挪用”他们的字句。学者多从男性视角来解读这位英国女作家,研究范围也比较局限,“题材狭窄”、“人物怪癖”、“语言幽默机智”是常见的话题,如在挪威、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批评所见。二战之后,奥斯丁小说开始更广泛地流传。欧洲开启一体化进程,民众对欧洲各国

刊于1889-1903年间,马拉美、纪德等都曾给这一刊物投稿。

的民族特征、比较文学和文化交流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是奥斯丁开始“受宠”的一个重要契机。意识形态宣传也产生一定作用,东德、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等国的学者,尤关注奥斯丁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和女性边缘化,借以批评资本主义制度。

不妨以两德为例。东德政府重视教育,注重以文学提高国民的思想情趣。欧洲古典名著成为实现这一教育目标不可或缺的手段。匈牙利文学理论家卢卡奇褒奖“批判现实主义”,认为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已经达到了较高发展水平。除了当代苏联文学,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成为东德教育和学术翻译重点。奥斯丁被看作是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前身,被置入一个男性作家占主导的现实主义传统中加以评介。此外,东德正倡导妇女解放,以奥斯丁为代表的十九世纪妇女作家成为研究重点。这样的情形和十九世纪末奥斯丁在英国的接受较为近似。当时英国社会上正讨论妇女问题,报刊借重奥斯丁的名声,宣传平等的教育机会,让更多读者觉悟到妇女的创造力和思考力。东德研究者甚至将奥斯丁和法国革命等因素结合起来,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对妇女的压迫。比较而言,西德不太关注妇女解放话题,而聚焦奥斯丁的女性视角和她对生活细节的关注。不过,造成东西德态度差异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政府的决定,而是社会的整体思想取向。后来欧美兴起了女性主义浪潮,很多西德研究者也转而讨论奥斯丁的社会意义。

迟至一九六七年,俄罗斯才有了第一个奥斯丁小说译本,落后于中国四十多年。黄梅在梳理中国奥斯丁研究状况时提到,奥斯丁由于题材局限于婚姻、家庭,不曾被革命导师提及……没有得到前苏联文化界认可”,在中国颇有影响的苏联学者阿尼克斯特撰写的《英国文学史纲》(一九五九)完全不提奥斯丁。一九八〇年代初,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主撰的多卷本《英国文学史》面世,仍旧对奥斯丁不着一字”。一九六〇—一九八〇年代,奥斯丁接受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研究机构,其小说远非民众的阅读对象。一九八〇年代中,恰值改革(glasnost)高潮期,奥斯丁逐渐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一九八六—

一九八八年间,前苏联外国文学图书馆的馆长热尼娃(Genieva)承担了奥斯丁传记和目录研究;与此同时,有人独自翻译了奥斯丁的六本小说。

三

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后,欧陆出现了“奥斯丁狂热”。一九九五—二〇〇五年是二战后奥斯丁作品翻译的高潮,六部小说除外,奥斯丁书信和少年之作也被译介。首先,东欧易帜、苏联解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东欧诸国占主导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向西欧敞开文化市场的大门,最明显的例子是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另外,此时恰好赶上英美奥斯丁电影和电视改编热浪,这更加刺激了欧洲民众对奥斯丁的追崇。

二十世纪末,电子和信息科技成为新的生产和传播手段,电影、电视、多媒体电脑等媒介手段交相作用,催生了新型的“视觉艺术”。影视越来越成为社会文化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尤其成为文化消费的重头戏。值得一提的是,奥斯丁电影、电视改编和“传统文化产业”(heritage industry)的关系极为密切。英美国家的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慈善团体和某些压力集团,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名义,大力宣传保护以物质形式存在的文化遗产,如建筑、景观等。根据奥斯丁小说改编而成的“古装剧”兼有广告效应,上映后,引起了巴斯、莱姆等地的旅游热潮,最终受益的还是“传统文化产业”的某些筹划方。

大量奥斯丁题材电影投入欧洲市场,不仅赢得了年轻人的青睐,还进一步催生了相当数量的新译本。比如一九九六年的荷兰,电影院放映了麦克格拉斯(Douglas McGrath)导演的《爱玛》,四种不同的译本跟风面世,其中两本为新

Brian Southam, "Introduction" in Brian Southam ed. *Jane Austen: The Critical Heritage* vol.II. (London: Routledge, 1987) 12.

黄梅:《新中国六十年奥斯丁小说研究之考察与分析》,《浙江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157-165页。

Robert P.Irvine *Jane Auste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169.

译本。在德国,一九九六年李安导演的《理智与情感》上映后,十种译本涌现市场,虽然新译本只有两种。诸多译本都从电影中选取剧照(still)作为封面,招揽读者。欧洲各国电视台和报刊刊载大量相关电影的评论。

影视版奥斯丁无处不在,青年人反倒没有动力去阅读原著。许多欧陆“简痴”并非“阅读”奥斯丁,而是“观看”奥斯丁。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认,忠于奥斯丁原著的欧洲读者并不多。电脑时代,文字日益失去优先地位,电脑屏幕逐渐取代了书本,成为更基本、更重要的文化传播媒介。现代观众常常沉醉于屏幕上英格兰乡村的芳草绿荫和湖光山色,其实奥斯丁很少描写室内外的物品和人物的活动场景。她讲究的是以精雕细刻的语言揭示个人心理和社会关系的深层问题,真正的“简痴”要能从语言艺术中感受到阅读的快乐。法国作家格林(Julien Green)曾经感慨:可以说,法国人还不认识真正的奥斯丁,因为翻译使轻盈利落的英文变得笨重拖沓。”看来,布鲁姆的担心不无道理,一般民众阅读的艺术和热情似乎正在逐渐消退,而这在奥斯丁的当代欧陆境遇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透过“大众化”喧嚣,我们瞥见了商业化的炒作和感官式的赏析。二十世纪初,亨利·詹姆斯早就指出,英国当时的奥斯丁热是出版商、杂

志社和编辑们追逐利益的结果。奥斯丁学者哈丁(D.W.Harding)也曾说,“简痴”们误读了奥斯丁,奥斯丁并不和蔼可亲,而是愤世嫉俗、冷眼旁观,她或明或暗地嘲讽那些自以为欣赏她的读者。在这一轮影视热中对奥斯丁作品和她的全球命运作冷思考,恐怕仍然是关系人类文明前途的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文学文化批评者们的课题之一。

【作者简介】龚葵,文学博士,中华女子学院外语系讲师。

哈罗德·布鲁姆:《为什么要阅读简·奥斯丁》前言,苏珊娜·卡森编:《为什么要阅读简·奥斯丁》,王丽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英美学者指出,帝国衰落、维多利亚社会的怀旧心理与市场需要相结合,推动并形成了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奥斯丁热。见Stephanie Moss,“Jane Austen’s Letter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Politics of Nostalgia” in Laura Cooner Lambdin and Robert Thomas Lambdin eds. *A Companion to Jane Austen Studies*,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0.

D.W.Harding, “Regulated Hatred: an Aspect of the Work of Jane Austen” in Ian P.Watt ed. *Jane Austen: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3.